

这是什么“做派”?

凌河

今日论语

这两天两条新闻,读起来如出一辙,同样引出了网上哗然。

一是说贵州多家医院,产妇产下婴儿之后,拿不到出生证明。什么道理呢?因为“没纸了”,出生证用完了,要层层上报后才加印,等到明年年初吧!因为没有出生证,所以不少产妇不能上户口办独生子女证等一应手续,甚至可能无法享受产假,平添了几分心焦。

更奇怪的是另一件事。早在8月22日,福建省高级法院就作出念斌无罪的终审判决,还了这个蒙冤8年的公民的自由。然而前几日,念斌前往福州市出入境服务大厅办理护照,拍照、填表、采集指纹

之后却被告知,他的身份信息在出入境管理系统中仍显示为“犯罪嫌疑人”,因此不能办护照!

出生证明“没纸了”,宣判无罪后仍是“犯罪嫌疑人”,没有“改过来”,这是什么问题?网友已经指出,这是典型的“官僚做派”——同一个“推”字一样,“拖”是正宗的“衙门作风”、典型的官僚主义。你在火里,他在水里,什么“民生无小事”,他那里慢慢地打太极拳,稳稳地朝南坐着,一个“拖”字,居然还被某些人当作“慎重”、“稳妥”的同义词,还觉得“合理合法”、天经地义,“有关方面”还振振有词。当然昨天也有解释,说是由于改了新系统,导致各医院有的已用完出生证,有的还有余,“无法调剂”,可这事9月份已发生了呀,为什么不及

时想办法呢?至于念斌事件,出入境部门则认为是司法机关没向其出具书面材料,责任不在我们啊。念斌之罪,判决已三个月,举国之间,尽人皆知,司法机关却“忘记”了将解除出境限制的通知送达“有关部门”,办证机关也不是不知道念斌已获自由,你不送来,我就“不问”!其实在念斌宣判无罪回家的两个月后,当地公安网上,他还是“犯罪嫌疑人”,还在“侦查”中。由此看来,说他只有一点点“官僚做派”,恐怕是不够的。

当然这种“做派”,远不止近日两大热闻。一家企业,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起诉,并由法院收了受理费,然而历时20多年,换了七任院长,居然到今天还没有审理;另一家企业,为了一个项目,

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烧了无数的高香,历时三年零三个月,居然“还在研究中”,至今没有下文。你看一个“拖”字,难道不是尸位素餐的官僚主义“做派”么?

值得一说的是,“犯罪嫌疑人”身份“不改”等事件,发生在反对“四风”业已两年的今天,“官僚做派”竟仍然没有绝迹,还在那里一“推”二“拖”。这也告诉我们,某些“部门”某些官员,江山好改,“做派”难移,他们“习惯了”,改也难,叫做雷打不动!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“一纠就灵”,一阵风就可以把病入膏肓的“官僚做派”统统刮掉呵——当然现在好了,媒体曝光以后,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,紧急调拨出生证明,预计近日即可满足需求啦,这毕竟也是一种“改作风”吧。

新民随笔

否定之否定

邵宁

“三十多年前生活困难的吃野菜和玉米面;如今是有钱的人吃野菜、吃玉米面。三十多年前没钱的人上下班走路;如今是有钱人在跑步机上走路锻炼。三十多年前有钱人穿涤纶,生活困难的穿棉布衣;现在是有钱人穿纯棉衣,困难的人穿化纤。三十多年前国家号召‘垦荒种田’;如今必须‘退耕还林’。三十多年前,很多人家把儿子叫‘狗子’、‘狗剩’、‘狗蛋’;现在很多人家把狗叫‘儿子’、‘宝贝’……”

这是近来在网上被频频转发的一个帖子,共有40多条,这里只摘录了几条。这样的对比,让人莞尔一笑,也发人深思。是的,过去不一定是落后的代名词,现代化的、高科技的,却不一定都是有利的。又比如,没有手机、没有微信的时候,家人倒是经常在一起聊天,而现在,恋人见面时也是一人一部手机,人在一起,心却远离。还有呢,以前大部分废品都送去回收,而后来所有不要的东西都往垃圾桶里扔,这几年为了环保又提倡起了垃圾分类。以上种种,都是“否定之否定”。

昨天东方早报刊登了一篇文章《荷兰:可持续的自行车》,说自行车已成为荷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许多人每天骑车去上班。荷兰首相吕特去非洲某国出访,早上骑着自行车就出门了,连保镖都没带。自行车道路系统、停放场所的规划设计,荷兰做得超过了被誉为“自行车之城”的丹麦哥本哈根。

想当年,中国才是世界著名的“自行车王国”。而当时在发达国家,马路上跑的都是汽车,老外也有自行车,但是用来锻炼身体,不算日常交通工具。能够开上汽车,是当年很多中国人的一个梦想,也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。今天,许多中国人实现了梦想,四个轮子取代了两个轮子,即便有人骑车,也大多换成了电动车。城市里马路越建越宽,却没了自行车的一席之地。

孰料,今天在欧洲不少国家,自行车居然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,既零排放,有利于环保,又能锻炼身体。在丹麦、荷兰、法国等国以及亚洲的日本,政府在许多城市辟出了专门的自行车道。

落后与先进,老土与时尚,就在“否定与肯定”中转换。要实现这种“否定之否定”,有时需要创新的胆识。

用法治规范红头文件

权威声音

抬头鲜红夺目,文尾印章庄重,本该权威严肃的“红头文件”,却不时让人啼笑皆非:有请求将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;有批评食堂“菜里没有肉”的;有要求完成“罚没”与年终奖挂钩的……近年来,全国对“红头文件”开展了多次清理。然而,“黑头(法律)不如红头,红头不如笔头(领导批示)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
红头文件泛滥,有的暴露出一

些地方政府部门法治观念淡薄,在“红头文件”中越权加重公民义务或剥夺公民权利,擅自增设行政审批环节或行政处罚内容;有的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行政权力认识不清,碰到事情不问是否合适,以发文表示重视,以发文开展工作;有的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制发规范性文件程序不明、要求不严、内容不规范、落实无监管、执行力不强。
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,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,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,依法撤销和纠正违法违宪的规范

性文件。这为以法治方式规范“红头文件”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,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一种有效手段,也是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办事、保障宪法和法律正确实施的需要。规范“红头文件”,还要强化源头治理,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。规范性文件形成后应及时公布,便于贯彻和接受群众的监督。对滥批乱发违法违规的“红头文件”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,应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(徐隽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新民新语

沉默的杜丘

华心怡

从点到面的成规模流行背后,物、事、人,永远都有着最深厚的时代印记。

香奈尔的粗花呢套装,是世界大战后女性解放的宣言。上世纪20年代美国黑酒横行,造就了一批走私酒品发达的流氓大亨,起因是阴差阳错的禁酒令。而玛丽莲·梦露的风靡,与邓丽君的传奇一样,全因时代和那个时代下的人民需要她们的风情。

昨天,各类媒体都被刷屏了。高仓健离世的消息,成为中国人对自己上世纪80年代记忆的集体悼念。1978年,《追捕》是那个时代结束后的第一部外国电影。杜丘的沉默与孤独,成为一个符号。原来,电影还可以这样。原来,男人还可以这样。东方硬汉,成为高仓健的银幕代名词。姑娘们,由此对奶油小生们全面否定。据说,杜丘那件出名的风衣被颇有经济头脑的某服装厂生产了10万件,不日售罄。那一年,不论是资历和辈分都怯生生的张艺谋还不到而立之年,他开始竖起衣领,常常沉默,并辞去了工厂的工作,考入电影学院。他说,杜丘是一盏明灯,为自己指明未来的方向。

再后来,高仓健拍了更多的电影,最终定格在205部。其中,《远山的呼唤》《幸福的黄手帕》等很多部都成为经典,并为他赢得无数声誉和奖项。不论演技是否精湛,卖相是否俊朗,中国观众为高仓健倾倒,是因为他们在寻找那时的文化环境、人情世故、生活碎片中可以仰望、可以期盼的一个立体的精神形象。在中国人最需要“杜丘”的时候,杜丘出现了。

再言之,放在社交网络横行、速食消费的今日,《追捕》和其他高仓健的电影,影评人或仍会打出高分,但叫好是否能够叫座?年轻人是否会买账?又或者,今日的明星,在网络上被搜索过几万亿遍的都教授和全美人们,在他们的生后,会留给已老去的粉丝多少唏嘘?娱乐价值几乎是全部的内容与核心,精神力量已全然无息,于是当代的明星们总是更容易被替代的。

杜丘与他的那个时代,早已不复。且沉默片刻,为过去,更为将来。



反腐畅想

一些贪官藏匿巨额现金,有关部门清点脏款动用大量人力,点钞机烧坏时有发生。有人戏言,可否研制生产反贪专用的大型高速点钞设备?
潘顺祺画

自由谭

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莫言估计忙得够呛,不仅人忙,连名字都闲不住。最近看到,莫言的家乡高密县,借着电视剧《红高粱》热播,要斥资16.7亿元打造一个“莫言乡村文化体验区”。

据说这个项目包括“一心一带三区多点”,要“还原一个立体化的莫言”。《红高粱》剧组留下的那3000亩红高粱悄然竖起了“红高粱影视基地”的牌子,莫言小说提到的红高粱酒坊、草鞋窝子、生死疲劳印象馆、蛙码头、白狗秋千架、酒缸塔等等,都将建设成景区。为此,又是调地、拆迁,又是招商引资、收取门票……可这么一个蓝图可观的计划,相关负责人却坦言不知道莫言本人的态度,也不知道莫言是怎么想的。

“莫言经济”莫言文化

薛世君

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,多次“请求”公众和媒体放过他,让他尽快回归作家本身,“安静地写点东西”。不过想安静的莫言,还是没有被高密县“放过”,“莫言经济”热闹登场了。

说起来,高密县从老乡莫言身上挖掘经济潜力还是后知后觉呢,早在莫言刚获奖那会儿,就有文化公司“深度包装和开发”莫言的签名、手稿、书法等,后来从“莫言牌”烟酒,到“被代言”烧鸡、旅游、房地产,再到“被冠名”征文大赛、被邀请出席各种活动等等,就没怎么消停。因为被过度关注、炒作,害得莫言不得不一次次站出来请求、声明、辟谣和打假。这样一来,你说莫言能静下心来写作吗?说好听这叫市场意识敏锐,其实不过是榨取名人价值。

莫言最大的文化价值在其文字,在于他的文学创作,可种种“莫言经济”现象,除了钱还是钱,也没看出什么正儿八经的文化追求来,还是莫言文化的好。

类似的事情,一直层出不穷。仅“名人故里”之争,就蔚为壮观。从老子、墨子到李白、曹雪芹……很多名人都被抢来抢去。学者们对名人的老家在哪里争辩几句,倒还算正常的文化现象,可一旦这种争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,就显得财迷心窍了。真实的历史文化名人无法满足需求时,虚拟的文学形象、娱乐化人

物也粉墨登场,典型如“孙悟空故里”、“二乔故里”和“西门庆故里”的争夺战,足见各地的“处心积虑”。

据说山东省阳谷县一开始打的是“武松故乡”牌,后来“移情别恋”西门庆。这是为什么?因为从武松身上“挖掘”不到“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景点”这样的项目,也“开发”不出“西门庆妻妾精美画像”这样的资源。可见有些地方急功近利到什么程度,饥不择食到何种地步?

包括莫言家乡在内的这些“名人故里”,在意的恐怕不是文化本身。啪啪作响的利益算盘,打着文化的旗号,却上演着腐蚀文化价值的戏码,既然都是钱的事,就别谈什么文化了。